

从黄河文化看新时代郑州的文化担当

黄海涛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具有鲜明的象征性和指向性。说明谋划黄河文化国家战略大发展,郑州是被党中央、国务院期待的重要支点和基地,希望郑州成为发展黄河文化国家战略的典型带动、示范推动的标杆。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指出,“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因此,黄河文化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双重属性都需要“讲清楚”。

一、国家文化战略下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黄河文化国家战略进行了顶层设计,提出了五项目标任务,其中的“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郑州首先要做“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排头兵,其任务就是担当黄河文化生态意识形态建设的标杆。黄河文化生态意识形态建设的地标建设,是黄河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郑州的历史文化发展及政治、经济、文化资质、战略地位赋予的历史使命和现实的责任。

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看,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经历了两大“国际运动”。与马克思在19世纪发现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一样,20世纪西方的学者发现了文化价值,并转换为国家文化战略。

国家文化战略的核心内容是信仰和价值观。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郑州要有所作为。

二、“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培根铸魂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郑州有充

分挖掘中华根、民族魂的血脉根亲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担当为中华民族培根铸魂的重任。

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中国文化战略必须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在制度层面,国家的文化意识或文化自觉,以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在精神层面,伦理型的中国文化期待一场新的伦理复兴和伦理觉悟。

国家认同源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源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就是意识形态的认同。

从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中华文化的起源来说,黄河文化的初生期孕育了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中华历史文化的主体是黄河文化;黄河文化的中心在中原地区的河洛文化圈内,河洛文化圈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河洛文化圈的核心精神文化标识,是人文初祖黄帝。黄帝带领先民开创了中华民族立起来的模式,开辟了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五千年道路。黄河文化生态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逻辑起点和内生动力。

从黄河文化,到河洛文化,再到黄帝文化,就厘清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黄河文化、河洛文化、黄帝文化、中华文化“四个讲清楚”的原则、脉络、层级、结构清晰,体系无缝衔接,给“四个自信”提供了扎实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培根铸魂”的依据。

黄河文化生态传承下的中国人,在进入工业社会时代,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又引进并拿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这是时代进步给黄河文化生态赋予新的使命与内容。黄河文化生态一直在海纳百川、包容共济中生存、发展。而且,黄河文化生态这个本土原创文化生态一直没有被消灭或被取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

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意识形态的安全就是如何传承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信仰,维系血脉根亲的凝聚。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大国,族群凝聚、集体认同、统一意志,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基石,是四大文明古国在东方独存的内在根基。

民族信仰还是民族修复的标准。许多国家的灭亡与分裂,根本原因是民族修复的失败。因为有信仰就有了民族修复的标准,因为无文化就有了民族修复的能力。

民族信仰的安全也是核心价值观。民族复兴,离不开价值追求的指引;砥砺前行,需要有精神力量的支撑。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黄河文化生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如今,世界各国之间的交融与较量,其本质就是生存与发展模式的交融与较量。黄河文化生态传承下的培根铸魂,为郑州提供了历史根基、当代价值、国际视野、人类高度。

三、重新认识郑州,构建历史文化和精神文化地标

在新时代、新使命的起点上,郑州如何担当?有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生态领域的担当,有政治文化领域和人文生态领域的担当。中央的规划动作必须要做好,郑州的自选动作一定要抓住文化优势、深挖文化资源、做好文化选题、实现文化突破。

站位、视野、格局,要求把重新认识郑州历史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当代价值提高到应有的地位上。黄河文化生态的打造,就是郑州作为中心城市如何带动的选题。“经济带动”和“文化带动”,也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黄河文化生态开发也需要精神文化地标。黄河文化、河洛文化、黄帝文化一

脉相承,最终形成以五千年的黄帝文化、黄帝精神为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3日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会见外方代表的讲话中饱含深情地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中华根,民族魂”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是多民族的中国最有效的黏合剂。

千年复兴、百年变局,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黄河文化国家战略需要旗帜,需要地标,需要郑州打造文化高地,需要郑州树立精神文化地标,需要大力宣传弘扬黄帝精神。

我们建议在郑州新郑的具茨山兴建全球华夏儿女、炎黄子孙共同仰望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地标,以及“担当民族复兴大任”(习近平语)的代表性地标,即兴建具有国家级、中华民族级标志性的轩辕黄帝巨型立像及百姓拜祖广场。树立华夏儿女共同仰望的物理地标和精神地标,“事关中华民族精气神的凝聚”(习近平语),事关中华民族根、民族魂的千年工程。不忘初心,培根铸魂,郑州不能缺席,黄帝不能缺失,黄河不能缺位。

黄河文化生态的精神文化地标,不仅仅是郑州打造黄河文化生态的需要,它还是河南出彩中原、举旗亮相的需要,它更是全中国凝聚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千年复兴中国梦的需要,它还是全球华夏儿女回忆祖先童年的歌谣、寻找回家的路、满足心理依存和族群凝聚的共同期盼,最终是落实“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战略部署的具体成果。

(作者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文化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学院研究员)

提振消费 是经济复苏的关键

姚洋



新冠疫情已经对中国经济和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就目前各地复工复产的情况来看,一季度我国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世界范围内,美国和欧洲也肯定负增长。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场衰退会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疫情会持续多久以及各国疫后恢复经济活动的速度。

目前,各级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支持复工复产,加速经济复苏。政府也出台了新一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直接提振有效需求,货币政策在提升有效需求的同时为企业注入流动性,防止企业出现流动性危机。然而,目前的财政政策过于偏向投资,而忽视了消费,因而作用可能是有限的。消费已经占到我国GDP总量的55%,而且,近些年来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一直在70%-80%之间。另外,零售服务业是消费的龙头,消费不振,意味着服务业就业不足,在目前的防疫形势下,两者更是一张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总是把就业摆在第一位,以为可以离开经济复苏单独搞高就业。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就业永远是和经济活动的强弱联系在一起。在技术不发生重大变动的前提下,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增长;反过来,没有看到就业增长,也不会有经济增长。

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考虑政府投资扩张的后遗症。自2008年以来,我国已经有过两轮政府投资的高潮,一轮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四万亿”,另一轮是2016-2017年应对经济下滑的财政扩张。现在即将形成第三轮政府投资高潮。政府基建投资有其合理性,但运动式的投资扩张后患无穷。最主要的问题是,在每一次投资高潮中,地方政府的商业性债务就膨胀一次,而这些债务基本上处于无人监控的状态,但最终还得中央政府买单。

如何提振消费?既然消费下降主要是因为民众害怕疫情复发、不敢出门去消费造成的,那么,提振民众的信心就是首要任务。

首要的是政府层面转变认知,放弃运动式抗疫方式,确立抗疫长期化的思想。根据北京大学刘德寰教授的研究模型,当人口中的感染率低于十万分之一的时候,感染率不会大幅度上升,而只有当感染率大于十万分之一的时候,暴发才会发生。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感染率在百万分之一级别,因此完全可以采取“佛系”抗疫方式,同时内部监控不放松,一旦感染率接近十万分之一再提高抗疫级别也来得及。在转变思路的基础上,应采取下述具体措施提振消费。

首先是传播科学防疫的知识,缓解民众的紧张情绪。两个多月的防疫经验告诉我们,只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如戴口罩、勤洗手,感染病毒的可能性是很低的。然而,目前各种传播途径给出的信息仍然是,防疫仍然是第一要务,为达到“零风险”的目的,政府宁愿关闭消费场所。如果科学家的判断是正确的,病毒不可能在今年内消灭掉。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上下必须学会与病毒共存一段时间。媒体的宣传和政府的措施都必须以这个判断为基础。

其次是放宽对企业和服务场所的防疫要求,除必要的个人防护措施之外,不要再因为一例新增病例就让企业或服务场所关停。可以要求企业和服务场所增加个人卫生设施,如增加洗手池,放置洗手液等。

再次是要用一些显著的活动给民众传递积极的信号。比如,中小学复课可以大大增强民众的信心。线下培训机构本来是一大服务业主力,但现在全都处于关门状态。显然,中小学不复课,没有家长敢送孩子去参加线下培训。

最后,一些财政补贴措施也可以帮助提振消费。一些城市发行了消费券,另一些城市出台了汽车消费的补贴,等等。这些措施在边际上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力度不足以重启消费。当前的情况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衰退,不是人们在边际上减少消费,而是全体民众一致性的减少消费,必须用很大的冲击才能重启。建议由中央政府给低收入者发放可观数量的消费券,资金可以通过国债来筹措。今年政府债务突破GDP的3%,甚至达到5%都是应该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提升产业发展质量的着力点

姜长云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受疫情冲击下外部需求发生逆转、内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要练好内功,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进一步释放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必须多管齐下,坚持“五个注重”。

注重坚持新发展理念的 systemic、整体性和协同性。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新理念引领新实践。顺应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先导。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整体,重视其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至关重要,要防止顾此失彼。如在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与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有机结合,推进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协调发展,努力形成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大合唱”。要注意通过强化创新驱动,全面提高我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也要注意让利益相关者共享产业创新成果,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注重积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良好营商环境的支撑。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重要要求。企业家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创造,离开了良好的营商环境都无从谈起。优化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不是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件,而是看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能否做到安心、省心、舒心,能否对未来充满信心。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有效落地生根,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深刻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帮助企业切实化解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痛点、难点,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

注重挖掘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令世界瞩目,有利于我国产业发展,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增加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余地。特别是面对疫情冲击,如果我们能用好多重有利因素,采取多种有效方式,从供给侧发力,改善供给结构,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想方设法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激发出来,就能为我国经济发展拓展更大空间。具体来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在鼓励企业创新的同时,有条件将细分市场、小众市场需求与企业规模化生产有效匹配,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

注重激发改革开放对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顺应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要继续坚定推进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带动我国产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成长,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培育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合作竞争的新优势。要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我国产业对内外开放和提质增效升级。

注重与改善民生、打好三大攻坚战有机结合。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和消费需求趋势,做好适应需求、创造需求、引导需求文章,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要围绕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激发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领域市场化改革对改善民生的促进作用,增强多层次多样化供给保障能力。要把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结合起来,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另一方面,要把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攻坚战结合起来。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警惕“陀螺干部”

《人民日报》近日刊文《莫当不推不动的“陀螺干部”》称:极少数干部不主动担当作为,他们遇到问题百般推脱、左躲右闪,甚至临阵脱逃。其中,有些干部被群众形象地称为“陀螺干部”,不推不动。这类“陀螺干部”各地都不罕见,他们忘了人民公仆的职责。许多事情就会因为他们的出现被耽搁、被干扰,使中央的决策难以落实,人民也会吃尽苦头。无疑,“陀螺干部”是改革发展稳定的“拦路虎”。

吴之如/画

“鼎”盛,从仰韶村到王湾



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

老人叫杨建忠,1959年北大考古系来到村里的时候,他14岁,还是个学生。“考古队来的时候,人手不够,来村子里找人,干一天给一块二毛五,我和我四哥参加了,开始是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后来我不上学了,天天去。”“挖出了好多瓶子、罐子、碗和瓮,光尖底瓶就有两种,考古队对每件挖出的东西都登记编号,工作做得细。不是太忙的时候,他们唱歌、跳舞,也教我们。有一个姓丁的女老师,可能是少数民族吧,经常跳少数民族的舞。”“1960年春季考完,他们离开了。两年后,考古队的李老师又来到王湾,他在复原一

个陶器时,发现少了一片,让我们帮着寻找,最后,在原来挖掘的地方真找到了!”杨建忠少年时代的这段经历,在一甲子之后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陶鼎折射出的安居生活

杨建忠的美丽回忆打开了一幅记忆画卷,但也不可否认增加了主观个人因素。了解王湾,还需要有客观的视角。王湾村北临涧河,洛阳市涧西区因位于涧河之西,故为今名。渑池学者李社描绘了涧河流域图:“涧水出(陕县)广阳山之阴,汇为古水,东流过(渑池)英豪谷水村,又东在渑池会盟台与渑水交汇始称涧水。经渑池县城南流经(义马)楚坑、千秋、(新安)铁门、新安县入洛阳城,东南过东周王城入洛河,又东伊河注之,在巩义市康百万庄园、刘镇华故居汇入黄河。”这篇文明的水系,联结着两个滨河的历史村落。从黄河之滨的仰韶村到涧水南岸的王湾,它们曾在同一时间维度下存在。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考古学家将王湾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期——第一期是仰韶文

化,第二期是仰韶晚期或由仰韶向龙山过渡的文化,第三期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豫西类型。在这里,鼎一陶鼎的发现,成为王湾遗址仰韶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区仰韶文化的骄傲亮点——半坡类型中没有鼎,庙底沟类型同样。

陶鼎贯穿了王湾遗址的三期文化。仰韶文化中,是鼎腹较深的罐形鼎;仰韶向龙山过渡的文化中,罐形鼎有变化,如腹鼓、底平;进入第三期后,依然以罐形鼎为主的鼎,但折沿有棱、足矮小,显然从二期发展而来。

陶鼎是仰韶时期重要的炊器,可以折射出人们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的特点。从仰韶文化时期起直至二里头文化早期,黄河流域的前人们,在长达二三千年的时间里,在大自然赐福与顺应天时的环境中,播种收获、制陶造器、繁衍生息、枝枝散叶。

那时的自给经济或许还产生不了“钟鸣鼎食”的排场,可是,没有陶鼎,又怎么有后世的青铜鼎呢?!

王宾实

讲述黄河边上的仰韶故事

仰韶与黄河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穿过时光隧道,追溯民族文化的历史源头,我们发现从古老、著名、具有华夏民族色彩的上古传说,到中华民族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早先的社会活动,无不与黄河流域有关。

从考古学、历史学中,还可以看到,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先人,就是在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创造了举世瞩目、名扬四海的“仰韶文化”。

《仰韶与黄河》,以行走的方式,讲述黄河边的仰韶故事。

本文可参与“有奖互动”,详情请关注“中报酒业”公众号